

学者书屋系列

大现代文学的 传统 文化渊源 选论

周引莉◎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Press

I206.6/169

2007

学者书屋系列

大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选论

周引莉 著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取之不尽的源泉。本书主要选取了大陆的代表型作家王安忆、海外华人作家白先勇、台湾作家余光中、香港作家金庸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对大现代文学受传统文化渊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选论/周引莉著.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1133 - 049 - 6

I. 大… II. 周…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770 号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24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 - 82519328
传 真 0451 - 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http : //press. hrbeu. edu. cn
E - mail : heupress@hrbeu. edu. cn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王安忆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当代演绎	9
一、“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王安忆与 古典诗词	11
二、“意足不求颜色似”——王安忆与中国传统绘画	28
三、“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王安忆与 戏曲	47
四、王安忆与《红楼梦》	67
小结	85
第二章 传统文化浇灌下的海外“奇葩”	90
一、大陆白先勇研究概述	93
二、白先勇短篇小说的“主情”倾向	105
三、宿命论对白先勇小说的影响	116
小结	138
第三章 “回头浪子”余光中	140
一、余光中诗歌论	141
二、余光中的散文理念述评	150
三、余光中的散文创作研究管窥	154
小结	163
第四章 金庸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165
一、金庸其人	165
二、金庸对传统文化的诗意关照	166

三、金庸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思考	169
第五章 从中外影视的比较看传统文化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175
一、从中外影视喜剧的比较看中国传统文化中 幽默因素的缺乏	176
二、从题材取向上的差异看中外影视的特色	182
三、中外影视的思想文化内涵比较	188
小结	196
附录	198
一、从存在主义角度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	198
二、从《海上花列传》到张爱玲再到王安忆	208
三、张爱玲婚姻中的传统意识与现代情怀	216
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28

导 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家取之不尽的源泉。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如果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势必会使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更好地解读 20 世纪中国文学,更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会使“小学科”走向“大学科”,使学科之间有更多的联系,以至出现交叉学科也不是没有可能;同时,也会对一些当代作家起一定的提醒和指导作用,从而提高当代文学的文化底蕴及文学档次。现在,一些著名的现当代文学专家已把目光转向与古代文学的结合,如杨义、杨匡汉、王富仁、黄修己等,这表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空间在不断扩展。要想更好地研究与发展 20 世纪中国文学,寻找其学术生长点,就不应该忽视它的渊源,应该对它正本溯源,使其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杨义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他说:“如果说我的文学研究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比较意识和贯通意识,始终是我非常看重的,它既是作为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学术境界,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思维方式贯穿于我的文学研究学术活动中。由于你两个学术领域,两个知识世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之进行比较,进行贯通。”^[1]

2006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7 日,由山东大学主办的“中国小说古今通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所谓“中国小说古今通识”,最简单地说就是要改变过去的那种按年代划分研究领域和学科的做法,打通研究,打通不同学科之间设置的种种学术樊篱,用一种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眼光来考查、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小说。这个主题让我们想到最近经常提到的“新国学”概念。在现代,“国学”概念是

章太炎先生提出的，是其在东西文学撞击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照。章太炎先生把国学从儒学方面扩展为一种更广泛的中国文化观念，是与西方学术对立的一个概念。新文化运动发生后，胡适先生又提出了“国故”的概念。把国学的范围扩大了。王富仁提到的“新国学”概念，包含将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打通，并同时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概念还把汉语写作（包括港台写作和海外写作）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囊括其中，这样从汉语文化整体观再来看其中的异同，以完成对中国文化的有机关照。王富仁认为，中国学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化和“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化，都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都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原来的“国学”概念已经不能概括全部的中国学术，因此也不再适应当前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他曾在厦门大学语出惊人：“国学不只是包括中国（传统——笔者加）学术，还包括我们正在研究的学术。研究李白、杜甫是国学，研究鲁迅、贾平凹也是国学，还有，中国人研究莎士比亚同样是国学。”简而言之，“新国学”是能涵盖中国学术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那么，有人会怀疑，这样的“新国学”不就成了一个无边无沿的概念了吗？那它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王富仁认为，“国学”就应当是一个包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及其成果的概念，小了，就不是“国学”了，就有了排他性了，就将一些学术门类排斥在中国学术之外了。那么，它还有没有意义呢？王富仁认为，它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每个研究者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整体观念，都要将自己的研究活动纳入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学术及其发展中意识其价值和意义，既不要将自己或部分人的研究活动视为中华民族学术的整体——“一手遮天”，也不必因为自己只是这个整体的组成成分而自惭形秽，泯灭自己的个性。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革命时代的文化与文学，是由旧蜕新时代的文化与文学，这是它的独立性，也是它对中

国文化的独立贡献，只有在“国学”这个整体中意识它的独立性，才能够既不扭曲自己，又能够意识到它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立意义和价值。“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提醒研究者要有整体观念与宏观意识。这无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打通”意识，也算由来已久，从20世纪80年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到杨义提出的“大现代文学”、杨匡汉提出的“大中国文学”，都是一种研究中的整体观念。

杨义提出的“大现代文学”，一方面包括大陆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另一方面也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文学。杨匡汉提出的“大中国文学”也是从地域上打通大陆、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樊篱，把只要是炎黄子孙所涉及的中华文化都涵盖进去。

据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一位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到国外访问，了解到“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注：所谓“海外中国知识分子”，“是指寓居海外多年，且已加入居住国国籍，融入了居住国生活的多个层面，但仍视自己为‘中国人’，且一直关心着中国文化现实命运的华人知识分子。他们不同于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后者在身份上已自然视自己为居住国国民，以一种较为纯然的国民心态参与着居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已习于把关注的重心落在居住国的现状上。”^[2]）在传统文化转换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回来后颇有点不平地说：“那些事原本该是我们的。”这种不平倒让人思考：为什么“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反倒比身处中华传统主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的转换上做得更有成效？这难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或许距离是一剂良药。王安忆有了美国之行，更坚定了她写“中国”的决心；白先勇居住海外多年，“美国经验”使他“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反而特别感到一种眷恋，而且看法也有了距离”^[3]；余光中与

大陆隔断多年，终以“新古典主义”的姿态成为“回头浪子”；金庸远在香港仍心系故土，从海宁传说引发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而厚积薄发，成为最受华人读者欢迎的作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毓生教授那本广为人知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到中国，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书中集中批判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反传统主义”，书中说：“这三个人在性格、政治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影响了他们反传统主义的特质，但他们却共同得出了一个相同的基本结论：以全盘否定中国过去为基础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现代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根本前提。因此，对‘五四’反传统主义所以激烈到主张中国传统应该予以摒弃的问题，是无法从心理的、政治的或社会学的概念来加以解释的。”关于新的“五四”运动的具体含义，白先勇1988年6月在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举办的“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会议上作过明白无误的解释：“我觉得海内外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在2019年即‘五四’运动100周年前，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文艺复兴必须是重新发掘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精髓，然后接续上现代世界新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文化重建或重构的工作。”^[4]有人将白先勇呼吁“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五四’运动”称作“白先勇旋风”。

海外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对“五四”的反思而关注传统。李欧梵就非常明确地说过：“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性为什么走错了路？就是它把西方的传统引进中国之后，把它看得太过乐观，没有把西方理论传统里面产生的一些比较怀疑的那些传统也引进来”^[5]，即忽视甚至无视西方知识界对自身传统负面因素的思考，其原因就在于“五四”以来中国“大体上是一面倒，被某一种民族情绪所推动，做乐观的一面倒”^[6]，这种态度既妨碍了对西方传统作出质疑批判的深层思考，也产生了对自己民族传统的大块“断裂”。

针对“五四”后中国文学多年忽视传统的偏差，“海外中国知识

分子”提出了“诗的‘中产阶级’”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是对传统的“中庸”之道精神的现代运用。著名旅美诗人非马1997年在《美华文化人报》发表《我们需要诗的中产阶级》一文，其中说道：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中产阶级（不太穷又不太富的小康阶级）的人口占大多数，这个社会通常会比较稳定。我想我们的诗坛也需要一个中层阶级。这个处在两极之间的诗人群，将遵循中庸之道（既不太保守也不太激进），用扎实的创作成果来构成诗坛的主流。主流之外，当然也需要有勇于冒险作试验的前卫诗人群……他们必须出身于诗的中产阶级，才有足够的历练和胆识来从事有意义的探索。而诗的百万富翁——高瞻远瞩、著作等身的大诗人——也只能从中层阶级里脱颖而出，而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暴发起来的。”

有论者指出，“面对炫奇出新、冲突对峙激烈的文化环境，‘诗的中产阶级’则以平和、稳健的创作来构筑文学的发展环境，他们既钟情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也熟悉西方文化的来龙去脉；他们坚持文化上的民族主义，但又从容出入于西方文化；他们富有创新的锐意；但其实践大多是渐进有序的平稳变革；他们始终坚持对人性的深入开掘，又坚信着人性的向上；他们艺术视野敏锐多向，而较少操之过急或持之过偏。他们的存在，是传统的中庸之道和现代的自由心灵结合的产物。”^[7]无疑，“诗的中产阶级”主张是借用传统对“五四”后文学的一种反拨。传统、本土融合于现代，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力倡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基本途径。白先勇在谈及台湾文坛时再三说过：“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还要加上台湾本土的创新与建设，这样延续下去，自成为一种文化新潮流”，“融合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舞，再加上台湾本土的文化，三者合在一起，自创一种新形式，而在太平洋两岸都能被接受”。^[8]

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辜鸿铭、钱钟书等一批大师少年出洋，游学多国十余年，在深谙异域文化和精通数门乃至十数门外语返国之

后，却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有的人甚至还拒绝白话文和简化字，坚持使用文言文和繁体字写作，并且依然达到了学术高峰，这究竟作何解释？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举出张爱玲、余光中、白先勇等人，他们也曾异国留学或生活，但当他们晚年，也是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张爱玲研究《红楼梦》与《海上花列传》，白先勇作“昆曲义工”，余光中自称是文化上的“回头浪子”，而且他们也都成了“大现代文学”的重要人物。这又究竟作何解释？“难道仅仅是说明了他们的‘好古’或守旧？或者是说明了中华文化强固的情性和强大的惯性？难道不可能或更可能同时也说明了这正是他们‘入乎其里，出乎其外’之后一种深刻选择的结果，由此而恰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魅力无穷呢？”^[9]

汪曾祺说过：“文化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化，没有办法使一种文化和另一种文化完全一样。”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有一次次学习西方的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诗派，到30年代的新感觉派、现代诗派，再到40年代的九叶诗派，及至80年代的先锋小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毕竟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当代小说的评论也有一度“西化”的倾向，但食“西”不化、生搬硬套的现象也很严重。因此，与其临渊羡鱼，盲目地学习西方，不如退而结网，老老实实在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更好地为当代服务。当然，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画地为牢，闭门造车。而是实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方针，秉持自主的、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平等、有益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日本的黑泽明电影早已证明，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一度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强调指出：“中国还是中

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韩少功的“寻根文学”旗号在当时得到了一些作家的纷纷应和，他们对韩少功的观点给予了支持与补充，他们普遍认为“当代文学充斥的是太多的社会学的内容，而缺乏文化的因子，今天文学界、思想文化界首要的任务是重新构建、弘扬我们的文化传统……”^[10]当然，文化寻根既有对民族文化精髓的确认，也有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批判，但整体上看，文化寻根的意义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重视。

童庆炳说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就在当代诗人的身边，他们的精神生命没有过去。如何接过他们的燃烧了一二千年的诗歌火炬是我们今人的责任。因此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11]寻找“大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主要是研究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等地有代表性的现代华文作家如何借鉴传统文化，古今结合，并在此基础上融汇中西的。由于杨义所提的“大现代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而很多文学史也把影视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唐金海、周斌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都包含影视部分。因此，本书也加上了从中西比较的视角来挖掘传统文化对中国影视的影响。

探讨“大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想做一个“全论”，对个人而言（尤其对知识储备与能力都很有限的笔者而言），简直是难乎其难。因此，本书充其量只是一个“选论”，主要选取了大陆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海外华人文学作家（美华作家）白先勇、台湾作家余光中、香港作家金庸作为重点论述对象。他们的创作成就有目共睹，而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联也颇具代表性。当然，这些作家不只是传统文化的受益者，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解读王安忆也可以从西方的理论视角入手。至于张爱玲对传统

文化的借鉴似乎已成定论，此类的文本分析也可谓连篇累牍，而笔者试图从婚姻爱情的角度再挖掘其传统心理，期望能充实“大现代文学”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由于这几部分与前几章有联系但又有相对独立性，特作为附录以弥补笔者研究的薄弱与不足。

注释：

[1] 杨义等《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生长点”》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

[2] [7] 黄万华《海外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换》见《华文文学》2001，3。

[3] 《白先勇自选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

[4] 参阅《台港文学选刊》1999年5期所载《白先勇旋风》。

[5] [6] 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M]。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3月版，153-154页。

[8] 参见叶维廉《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思考》，台湾《联合报》2000年3月7-10日。

[9] 朱向前《中国文学：究竟在何处定位——以九十年代的几部长篇为主要考察背景》，《作家报》，19970807。

[10] 王万森主编《新时期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61页。

[11] 童庆炳《“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与九十年代的“国学热”》见《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

第一章 王安忆对中国古典 美学的当代演绎

从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以来，王安忆的创作已有20多年的历程。从“雯雯”系列、《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到《小鲍庄》，从“三恋”、《岗上的世纪》到《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再到《长恨歌》、《我爱比尔》，又到《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桃之夭夭》等，可谓佳作连连。其作品之多，影响之大，在当代文学史上成为不可忽视的独特风景。有人赞道：“读王安忆的小说，你才真正体会到生命的状态是怎样得优雅，你惊异生命的每一个瞬间竟然能被抒写得如此绚丽多姿、繁复灿烂，而时光和回忆的每一道阴影，又是如此细微、深刻地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王安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以《小鲍庄》为主的寻根文学研究；以“三恋”、《岗上的世纪》为主的性爱小说研究及女性主义研究；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等为主的精神探索研究及叙事研究；王安忆与张爱玲等女作家比较、与海派联系的研究；《纪实与虚构》、《米尼》、《长恨歌》、《我爱比尔》、《上中红菱下中藕》、《富萍》、《桃之夭夭》等的单篇解读研究；乡村与都市抒写的研究等等。可以说，对王安忆的研究已是成果颇丰，而关于王安忆与传统美学的关系，仅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如张清华说过：“《长恨歌》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神韵与叙事的模型。我相信这将是这部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生命力的一个原因。”^[2]王安忆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神韵显然是王安忆创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色，但针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人作系统的研究、论述，这是王安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本论文旨在探讨

王安忆怎样在创作中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美学精神。

1998年秋天，王安忆出访台湾，台湾的同行询及她的文学向往，她回答了简单的五个字：我向往古典。在一次访谈中，王安忆说：“总体上我的小说创作是不太现实的，我对现实不很关心，我关心的是审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我写？就是有审美性，而现实太没有审美性了。”由此，审美、古典便成了解读王安忆少不了的关键词。王安忆是个重视传统的作家，她从传统那里汲取了很多营养，她曾说：“古典文学于我是永远的欣赏，我完全放弃我的怀疑和判断，以一种盲目，迷信，甚至信仰去读它们，它们对我有一种先祖的意味，我别无选择，别无挑剔，我无条件地去敬仰和爱它们。”^[3]她还说过：“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精神需要救赎。我一直觉得我们‘父’与‘子’的关系不理想，好像没有承继，好像永远在一种背叛中。实际上你有承继才有背叛，你没有承继怎么去背叛呢？对我来说，我宁可跨过现在60至70岁的那代人，直接与80多岁的那一代沟通，我们总在说那一代人扭曲自己的人性。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一个个人主义环境里长成，他们的后半生在提升自己的人性。你看丁玲那一代人的回忆录，如果说他们不懂人性，那么与他们相比，我们更不懂了。他们那一代人有一种提升的要求，纯洁、浪漫、抒情，而我们这一代呢？轻视传统，排斥继承，只有反叛，莫名的反叛。”^[4]

对传统的重视使王安忆的创作常常有意或无意地靠拢中国古典美学。读王安忆的作品，有时会被她巧妙穿插的古典诗词所吸引，从而在当代小说中得以回顾古典诗词的精妙；有时又慨叹她工笔画般的细致笔法、水墨画般的冲淡意境，好像被宋元画风洗礼了一番；有时会发现中国戏剧的精髓也影影绰绰地闪现其间；有时又禁不住联想起《红楼梦》……王安忆兼采多种古典艺术的精华，使她的小说渗透着古典美学的光彩。“与那些层层迷雾的作品相比，王安忆的文学世界似乎缺乏一点制造深度、给读者设障的现代派技法，她的语言结结实实，

没有太多的杂质，内涵指涉都质实而确切，一副水落石出的情景，其实，只有经过充分理性准备之后的创作，才有一份清晰明朗的表达。”^[5]

一、“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王安忆与古典诗词

王安忆从小就受到古典诗词的熏陶，她的母亲茹志鹃曾说：“我们对安忆也没有刻意培养，主要是靠她自己。回想起来，在她幼时，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赏的宋词，贴在床头，教她吟诵，为她讲解，这是一种乐趣，至于能起多大作用就难说了。”也许正是这种并非刻意的培养使王安忆对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我看散文》中对中国诗词的格律韵脚、意境、趣味及独创性、传神性等方面作了由衷的赞扬。她善于从古典诗词中汲取营养，她对古典诗词或移用，或化用，推陈出新，演绎变通，创造出既有古典韵味又有现代气息的佳作。她曾说：“小说是散漫的，实用性很强的语言，内里也是有着格律的，不相信你读读看。还有，尽可能地用口语的，常用的，平白如话的字。这些字比较响亮，有歌唱性，《诗经》中‘国风’的那种，明代冯梦龙的‘挂枝儿’，也有点那意思。这关系到整篇小说的气质，世俗里的诗意。”^[6]她还说，“当然，真正好，还是好不过民歌，民歌以及民间故事的格式，大约都来源于《诗经》。简单的体式，每一段基本相同，只略有变化：‘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反复歌咏，就那么一小点变化，推进了旋律。于耳于心，都极愉悦。”^[7]

王安忆笔下的故事虽然平凡细小，却让人读起来有滋有味，别有一番情致，而这情致需要我们像品潮州工夫茶那样细细地品，慢慢地尝，看看它是怎样“润物细无声”般地沁入心脾。王安忆在语言、技巧、人

物塑造、渲染环境及结构情节等方面都借鉴、化用了古典诗词（包括民歌）的精华，这使她的作品通俗中透着典雅，现代中传着古韵。

（一）化用古典诗词及穿插文言词汇

语言是文学作品最直观的反映，“在语言清晰度上，王安忆始终把握一个理想的尺度，既不是一味的明白如话，也不过分追求含蓄、厚重，形成一种明澈的文体风格，给读者创造舒适的语言情绪和审美氛围。阅读王安忆的作品，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碍和感觉中的迷津，却能够感受、回味和欣赏到作家精心创设的意境和审美感情。”^[8]这种意境和审美感情有时是通过化用古典诗词及穿插文言词汇来体现的。

《上种红菱下种藕》有这样几句：“在水泥的房檐底下，竟也筑了燕子窝。并且，还是旧年的燕子。并且，谁家的燕子还是谁家的燕子，一点不曾出过错。这都是几十代的燕子了。傍晚，老燕子领了小燕子学飞，漫漫的一片，从老屋的顶上过去。”《隐居的时代》中有几句类似的：“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燕子寻归旧巢的习性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从王维的“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到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又到宋人田为的“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以及晏殊的“似曾相识燕归来”，再到清人周京的“烟雨疏疏覆绿苔，海棠时节燕重来”等，恐怕都成为王安忆化用的源泉。又如：“下弦月从云后边走着，云像烟一样，于是，清楚一阵，模糊一阵。身后稻田里，蛙声一片。”这岂不是化用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伤心太平洋》中有这样几句：“我父亲抵达上海的时候，当是一九四零年的深秋，上海的法国梧桐的落叶，一大片一大片地落在地上。落叶的景色是我父亲有生以来头一回领略，他觉得这真是天上奇观。秋风肃杀也是他头一回领略，他一身单衫，抖抖索索。”古人云：“时